



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落实的 可行性探讨

吕耀东

[摘要] 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是中日关系的历史性概括,具有针对客观现实的建设性和可行性。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曲折历程证实,坚持“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才能真正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鉴于日本政府仍有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意愿,中国政府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角度缓和中日关系,并在日方承诺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的前提下,达成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力求实现中日“四点原则共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将成为中日关系未来的新常态。

[关键词] 中日关系;四点原则共识;可行性;建设性;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15.05.002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5)05-0013-(11)

[收稿日期] 2015-07-07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日本海洋战略研究”

[作者简介]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外交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7)

从中日关系发展的角度看,通过双边高层对话形成原则共识,有利于维护两国关系乃至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尤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相互作用的局势总是同时并存,接连不断的”。^[1]中日两国的双边互动亦是如此。2014年11月7日,国务委员杨洁篪与到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时指出,中方一贯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中日关系。谷内表示,日方高度重视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双方就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第一,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第二,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第三,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第四,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

建政治互信。^[2]上述四点共识是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下处理两国关系的具体化指针,是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经验及教训总结,凸显明确的原则性特征,均事关当前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同时其鲜明的“共识性”亦体现出对于改善中日关系的建设性思路。

一、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经历曲折前进的历史事实明示,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及各项原则,是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治基石。它从政治上、法律上和事实上高度总结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指明了中日关系的未来。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将其放在第一条说明四个政治文件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要遵循四个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中日关系就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历史事实证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随着面向21世纪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确定,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既是确保中日关系发展大局的政治及法律保证,也体现出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变化、发展的历史连续性。

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日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日关系正常化开创了两国关系史的新纪元。它消除了二战后中日两国的隔绝状态,揭开了当代中日关系的新篇章。它不仅恢复了中日两国的历史传统友谊,为两国的友好交流重新拉开序幕,同时也为东亚区域合作创造了和平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日邦交正常化创建的睦邻友好关系新局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日两国政府基于《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但作为曾经交战的双方,从立法程序上说,政府间联合声明的内容还必须通过签订和平条约的形式加以确定。周恩来总理就曾对日本友人说,中日双方要缔结的和平条约,不是单纯宣布战争状态结束,而主要是在于使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并建议称之为“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后,两国领导人相继互访,形成官民并举、多渠道、多领域、多形式、多层次交流的局面。中日双方领导人在互访和会谈中不仅涉及中日双边关系、对于共同关心的亚太地区的形势及其他国际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彼此均认识到,为了各自的和平与安定,进而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必须加强友好合作;要按照《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发展和平友好的关系。这些富有建设性的“共识”,反映了中日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紧密联系。

冷战结束凸显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两国在钓鱼岛及历史认识等问题上的摩擦表面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摩擦逐渐增多,但中日双方都意识到,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亚太地区的成员,两国对亚太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重大责任,有广泛的合作前景。基于这样的认识,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发展都采取了向前看的姿态。^{[3](141-145)}中日两国都注意到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逐渐从冷战结束时的政治摩擦中摆脱出来。为了加强两国的相互理解与信赖,避免双边关系的恶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构筑更为成熟的双边关系成为历史必然。为了维护冷战后的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1998年,中日两国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发表了继《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的联合宣言》。该《宣言》指

出,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仍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首要课题。^①中日两国将致力于和平友好交流,加强在高科技、环保等领域开展前瞻性合作。两国努力增进政治互信,以构建“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力求中日关系克服和适应国际格局变动的冲击。

进入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出现起伏和波折。小泉纯一郎首相当政期间六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严重恶化中日及周边国家间关系,使得日本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改革愿望受挫。为了改变日中关系的“经热政冷”状况,扭转小泉内阁时期亚洲外交失败的局面,2006 年初次执政的安倍晋三提出构筑日中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倡议。至此,日本方面的战略天平从“中国威胁论”倾向于“战略互惠论”。这样的对华政策理念,在福田康夫内阁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政策实施和实际贯彻。福田内阁有意回避安倍内阁时期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外交”等被视为“遏制中国”的对华政策理念。他明确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日中战略对话与合作,推动构建日中“战略互惠关系”。2008 年 5 月 7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期间与福田康夫首相签署联合声明,《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成为两国“第四个政治文件”。该《联合声明》维护和巩固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为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创造有利条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中国愿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做出贡献,日方对此表示支持”。^②这表明日方已经意识到:对华“两面下注”的外交策略,不仅无益于改善日中关系,也会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产生消极影响。这体现了日本决策者务实的一面,客观上为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声明》宣布,中日“双方相互视为合作伙伴,不是威胁。”^[4]可以说,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的确立,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为新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提出与时俱进的新构想。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努力“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基础上的互惠关系”,力求通过全方位对话磋商消解彼此业已存在的困局,最终以缔结“四个政治文件”的形式,实现了中日关系的建设性发展,为扩大双方的、地区的乃至全球的共同利益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中日两国在各领域交流合作的日益扩大,双方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基本保持着良好沟通与协调,基本体现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内涵。纵观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承接性,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原则精神,是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框架和行为准则。《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清晰地指明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四个政治文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是中日关系克服矛盾和障碍,不断前行的政治基础。所以,不能因时代

^① 1998 年《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的联合宣言》宣布:“双方重申,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发展是两国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双方不在本地区谋求霸权,不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纠纷。”“双方认为,中日两国作为亚洲和世界有影响的国家,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双方将在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性问题等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及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http://www.fmprc.gov.cn/chn/gxh/wzb/zxxx/t5437.htm>,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页资料版。

^②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ywzt/2008zt/hjtcfrb200805/zxxx/t450471.htm>,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页资料版。

发展与世界格局动荡变化,就割断“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承接性,否则,推动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就会成为空话。

二、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改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维护双边正常国家间关系的正确路线。“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给中国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坚持向前看,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温家宝总理于2007年赴日“融冰之旅”时,在日本国会演讲时阐述了上述中日关系的历史、教训和未来。^[5]2014年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中的第二点也再次明确:“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也就是说,改善中日关系的出路在于日方能够“正视历史”,中日关系才能“以史为鉴”。

历史事实证明,只有日方能够“正视历史”,吸取历史的教训,中日关系就能够顺利发展,反之两国关系就会出现倒退甚至恶化。1995年,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日本一些保守势力和右翼分子不但不认真反省侵略历史,反而出现否认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言行。社会党关于以国会形式通过“不战决议”向亚洲国家谢罪的决议,遭到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的反对。对此,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之际指出:“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①正是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才平息了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对于日本国内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言行的强烈反弹。

在19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桥本龙太郎首相在日本第140次国会例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指出,“要努力发展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日中关系,以便我国同中国两国的国民能够衷心祝福邦交正常化25周年。桥本首相访华期间,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花圈,并作为战后首相首次访问了中国东北地区,在沈阳参观了“九·一八”事变纪念馆。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桥本首相时指出,“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段历史是两国面向未来的重要前提。否认历史、干扰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势力在日本国内虽然只是极少数,但他们的错误思潮影响很坏,我们应该‘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特别是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和引导年轻一代十分重要,这有利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也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6]桥本首相表示,1995年8月15日,日本村山内阁就历史问题发表的谈话,是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日本今后会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会走军国主义道路或成为军事大国,这是日本全体国民的共同意志。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的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对日本进行了一

^① 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5danwa.htm, 参见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网页。

次“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国事访问。在同小渊惠三首相的会谈中,江泽民主席全面阐述了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他指出,近年来,日本国内有人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行,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小渊表示,为发展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有必要正视过去的历史,对日本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再次向中国表示反省和道歉,并重申日本继续坚持和平发展,不走军事大国道路。在双方发表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的联合宣言》中,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①这首次以书面形式承认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并在会谈中首次就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道歉。^{[2](198)}江泽民主席在这次访问中强调了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明确了中日关系恶化的历史根源所在。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历史修正主义日盛,中日两国关系就此进入了历史认识问题纷争时期。日本内阁成员不断出现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翻案的言行。特别是小泉首相六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靖国神社的不当行为,使得中日关系严重恶化。小泉首相的政治目的是企图通过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常态化,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罪行,践踏受害国家及其民众的民族感情。

安倍晋三就任首相以来一贯坚持“历史修正主义”观点,屡屡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安倍在《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认为所谓“‘甲级战犯’存在着误解”,称“那场战争无罪人”。这是对“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严重挑战,是对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挑衅。安倍等人力求通过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重建”日本因战败受挫的“自信心”。因此,日本官方屡次通过篡改历史的教科书的审定,导致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社会思潮日盛。日本政要频频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借右翼势力的“新日本历史教科书”,否认强征从军慰安妇、美化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等行为,成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突出表现形式。这种对于日本二战侵略历史不加反省的“肯定”,恶化了中日关系,是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相悖的。

中日两国唯有以史为鉴,才能发展良性的双边关系。在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于二战加害国日本而言,是日本正视历史、反省历史的机遇之年。但是,在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会议上,安倍在发言中提到了“反省”,但未提及“侵略”。他访美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虽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伤害表示“懊悔”,但却拒绝就慰安妇问题明确道歉。安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仅声称日本在二战结束后怀着对战争“深切的自责”重新起步,却刻意回避提及“道歉”二字。另外,日本文部省审定的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安倍内阁成员及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都是在用行动否认“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而“村山谈话”及“河野谈话”构成了日本战后对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反省的根基,是历届日本内阁历史认识的试金石。2007年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曾表示,日方认真反省那段令人痛苦的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建立面向未来的日中

^① <http://www.fmprc.gov.cn/chn/gxh/wzb/zxxx/t5437.htm>,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页资料版。

关系。但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含糊其辞,实质上就是历史修正主义的具体表现。时至今日,能否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精神,“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成为考验安倍等人是否遵守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关键。

三、基于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及东海问题,推动构建危机管控机制

近年来,日本不断挑起东海权益纠纷事端,行攫取中国钓鱼岛之实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47条第5款规定“群岛国不应采用一种基线制度,致使另一国的领海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隔断”。日本以其基线划出的专属经济区割断了中国钓鱼岛的领海与中国的专属经济区的联系,^[7]已经严重侵害到中国的领土主权,“东海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改变。日本企图通过挑起东海权益纠纷,逼迫中国接受其单方面划定的所谓“中间线”,企图将中国的钓鱼岛最终变成日本的“囊中之物”。

在日本决策者看来,从冲绳列岛、台湾岛和南海一线的海上通道是日本海洋战略的“生命线”。近年来,日本国内从“岛国到海洋国家”的“海洋国家论”日盛,以保护海路及海洋航线安全为由,不断加强对周边海域的海洋调查和军事控制力度,进而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海洋正当维权。“而这不免令人怀疑其中是否隐含着‘一石数鸟’的作用——除了囊括本土海域大陆架、远海外大陆架的矿藏、渔产外,夹带、包裹着钓鱼岛的主权”^[8]。同时,日本自卫队加强“西南岛屿有事”的应对,日本西南方向防卫力量的准备提前完成。据日本防卫厅内部资料表明,2004年11月,日本防卫厅编撰了题为《日本西南岛屿防御计划》的文件。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文件中所说的“西南岛屿”涉及中国的钓鱼岛。^[9]日本海上保安厅在2005年以后将中国钓鱼岛列为警备重点,并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增配飞机加强警戒。不断强化钓鱼岛周围的警备和监视活动,并非法将中国钓鱼岛记载为日本“固有领土”。这些不当行为进一步反映了日本以“保护海洋权益”为幌子,企图攫取钓鱼岛的战略意图。

为了缓和中日在钓鱼岛及东海问题的继续恶化,2006年以后,随着中日政治关系的缓和,中日共同推进两国防卫安全领域的对话与交流。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中日双方确认将促进包括安全领域在内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构筑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同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章沁生中将与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守屋武昌在东京举行了第七次中日防务安全磋商。双方磋商成果有三:一是双方就两国防卫安全高层互访达成一致;二是增加军事交流,并为启动中日军舰互访而努力;三是启动中日防务热线,防止发生海上不测事态。此次磋商对于增进双方在防卫安全领域的理解和互信及交流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2007年4月11日,温家宝总理访日时,双方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就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中国国防部长访日和尽早实现中日双方舰艇互访等防务问题达成了共识:并就“建立两国防务当局联络机制以防止发生海上不测事态等达成了共识”。^[10]该《公报》的发表,促进了两国的防卫安全交流,反映出两国共同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意愿。曹刚川国防部长应邀于2007年8月底的成功访日,对促进中日在安全领域的理解、互信和交流意义重大。中日就双方舰艇互访及防务部门间开设热线等防卫交流事项达成许多共识,并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防卫交流,增进两国防务当局间的相互信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深圳号”导

弹驱逐舰于2007年11月底的成功访日,实现了中国军舰二战后对日本的首次访问,开创了中日关系在安全和防卫领域增进互信的先例。

2007年底福田首相访华时,中日两国领导人还就东海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原则性共识和“决断”,增进了两国之间的互信和理解。^①2008年5月7日,胡锦涛主席和福田首相在东京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中日双方达成“将继续举行高级别防务安全磋商,为防止海上发生不测事态,建立中日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首轮专家组磋商,为早日建立该机制而努力”等共识。

然而,以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为契机,日本在钓鱼岛及东海问题上制造事端,再次恶化中日关系。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之后明确深化钓鱼岛“国有化”的政治过程仍在持续,日本政府和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频频升级,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大局,使得两国关系不断恶化。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后,日本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更是强调日中两国没有领土问题的强硬立场。安倍晋三、石破茂及町村信孝等保守派政要均主张日本政府无需撤销钓鱼岛“国有化”,均主张强化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的防卫装备。^[11]扩充自卫队及海上保安厅的人员预算,制定有关领海警备的相关法律。^[12]日本2014年《防卫白皮书》妄言中国“依靠海上和空中战力从质和量两个层面迅速扩大海洋活动”,为日本扩大军力部署、调整防卫政策和行使集体自卫权寻找借口。该白皮书强调,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使日本的和平和安全更加确定,具有历史性重要意义”。^[13]并突出2013年12月制定的今后10年安保政策基本理念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新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備计划》中提出的“统合机动防卫力”概念,表示将强化在日本西南诸岛及“离岛”的防卫措施。该白皮书还指出中国的军事动向受到“地区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为此将增强日本南西诸岛防卫力量。2015年《防卫白皮书》刻意渲染中国海洋维权活动“存在有可能招致不测事态的危险行为”,还针对钓鱼岛及东海天然气田等问题,尽快在冲绳与那国町部署沿岸监视部队以及组建水陆机动团加以应对,力图以此达到增加防卫预算投入,扩大军力部署之目的。

中日“东海问题”不仅是海洋权益纠纷,而且涉及领土主权问题。尽管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扩大“东海问题”危机事态,中国仍然从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重申在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双方确认的“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文件精神,并于2014年11月与日方达成缓和中日关系的“四点原则共识”。其中确认,“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基于这样的共识,中日两国防务部门于2015年1月12日在东京举行了海上联络机制第四轮专家组磋商,双方就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相关内容及有

① 2007年底福田首相访华时,中日两国领导人还就东海问题达成以下共识:(一)继续坚持两国领导人2007年4月达成的五点共识精神,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二)双方已提高磋商级别,就东海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进行了认真和实质性的探讨,取得了积极进展;(三)双方同意在保持司长级磋商框架的同时,根据需要进行副部长级磋商,从中日关系大局和国际法出发,在迄今进展基础上做出共同努力,尽早就解决办法达成一致;(四)妥善解决东海问题符合中日双方利益,双方同意在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进程中争取尽早解决这一问题。

关技术性问题进行了协商与沟通。^①1月22日,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第三轮磋商全体会议及工作组会议就中日关系、东海有关问题及海上合作等内容达成一致。^②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在第十三次中日安全对话(2015年3月19日)会议上所言:中方针对日方近年来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动向表明了关切,希望日方树立客观、理性的对华认识,坚持“专守防卫”政策,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③

四、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中日政治互信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曲折历程来看,若仅仅发展经贸与民间交往,而不能在政治、外交及安全领域增强互信,要想从根本上改善中日两国关系是很困难的。进入21世纪的中日关系重点从“增信释疑”入手,化解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变动及双边突出问题对于两国关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初期,冷战结束凸显中日之间业已存在的纠纷和矛盾,两国关系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继小泉纯一郎首相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刻意恶化中日关系,安倍晋三执政后仍对中国采取了合作与防范并举的“两面下注”战略,并没有放松防范遏制中国的行动。具体表现在:一是大力强化日美同盟,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对台湾问题摆出干预态势。二是加紧构筑围堵中国的国际联盟,包括强化日美同盟,密切与北约合作,提出构筑日美澳印的“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战略意向。但是,中国始终没有放弃维护中日关系及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积极缓和中日双边关系,通过多层次交流、对话,增进了两国政治互信。通过“全方位”的双边互动,促进了中日关系稳定发展。中国通过APEC会议、亚非首脑会议、中日韩首脑会谈和10+3首脑会议等一系列多边场合努力化解彼此矛盾,缓和中日关系。

2006年,中国国家领导人相继就中日关系明确指出,发展中日世代友好关系是中国的一贯方针,两国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立足长期视野,依据大局”的观点,共同构筑新世纪的中日关系。从2006年10月以后,中日两国展开了政府、执政党、议会及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穿梭外交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通过一系列对话机制的完善,推动战略对话,就一系列重大问题扩大了双边共识,中日关系进入了战略互惠关系形成期。2007年3月16日,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访华时表示,自民党“作为执政党,今后将为加强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而继续努力”。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并在国会众议院发表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从历史的维度,道出两千多年来中日关系的友好脉络;用“以德

① <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td/t122820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网站。

② 2015年初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第三轮磋商全体会议及工作组会议就中日关系、东海有关问题及海上合作等内容达成一致:双方同意争取早日启动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并就此进行磋商;中国公安部边防局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同意继续就打击走私、偷渡等海上犯罪进行合作;中国海警局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同意建立双方总部之间的对话窗口,并尽快讨论进一步合作的方式;双方同意在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框架下,加强海洋政策及海洋法对话;双方同意根据有关国际法加强在搜救、科技及环境等领域的海洋合作;双方原则同意2015年下半年在中国举行第四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具体事宜将通过外交渠道商定。上述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网站, <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td/t1230654.htm>。

③ <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td/t1247302.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网站。

报怨”的崇高姿态,讲述了中国人性对待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及战后遗孤的仁义大国情怀;真诚表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中日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明确提出面向21世纪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则、立场;以东方文化的情愫,抒发了对中日友好与合作未来的憧憬。温家宝总理表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两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课题。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两国领导人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14]2007年3月22日,中国全国人大与日本参议院定期交流机制首次会议召开,路甬祥副委员长率领全国人大八个专门委员会代表访问日本,与日本参议院代表就政治、安全、经贸和能源环保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讨论。9月14日,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自民党总部会见了由执政党议员组成的“发展日中关系议员之会”会长森喜朗及福田康夫、二阶俊博、北侧一雄等成员。双方确认今后继续努力发展日中友好关系。森喜朗会长表示,“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本为构筑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将尽最大限度的努力”。贾庆林则表示,无论日本政局发生何种变化,中国都将坚持发展中日友好。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屡屡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两国首脑互访一度断绝。中方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极大的耐心维护中日关系大局。2007年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到访的福田首相表示,中方愿与日方一道,以两国高层互访和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话与磋商,增进理解和互信,妥善处理两国间的重大敏感问题,进一步以实际行动落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08年5月7日,胡锦涛主席和福田康夫首相在东京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积极评价中日战略对话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该《联合声明》中,中日双方确认,增进政治安全互信对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要意义。^①2009年4月29日,温家宝总理和到访的麻生太郎首相的会谈中强调了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发展两国关系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同时称,政治家应重视两国国民利益,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妥善处理历史问题。

然而,2012年日本非法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的脆弱性再次显现,加之安倍晋三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修正主义言行,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两国首脑互访再次断绝。鉴于日本政府仍然有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意愿,中国政府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角度缓和中日关系,并在日方承诺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的前提下,达成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中日就两国间的主要问题、地区秩序和国际问题进行积极对话,在构建战略互惠关系方面不断扩大共识和合作领域,积极而渐进地推动中日两国的政治、外交和安全对

^① 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就“增进政治互信”共同决定:一是建立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原则上隔年互访,在多边场合频繁举行会晤。加强政府、议会、政党间的交流和战略对话机制,就双边关系和各自内外政策及国际形势加强沟通,努力提高政策透明度。二是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高层互访,促进多层次对话与交流,进一步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三是“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j-c080507-2.htm>,参见中国政府网。

话与磋商,增进双边政治互信积累。

五、结语

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愿望是基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历程的客观认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双边共识,是确保中日关系曲折发展的指导方针,体现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四点原则共识”正是基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总结,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建设性理念。第一点共识涉及如何对待中日关系的基础,第二与第三点共识涉及如何处理中日关系中的历史以及领土主权问题和症结,第四点共识涉及如何推进中日关系的良性互动。正如王毅外长2014年底会见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双方委员时所言:“日方希望两国关系回到战略互惠关系这一原点。而我们要思考战略互惠的原点是什么,很清楚,就是构成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四个政治文件。不久前发表的四点原则共识,也是在这一基础上达成的”。王毅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程反复证明,只有维护好这一政治基础,两国关系才能健康顺畅发展。^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引领下,过往两国在经济、文化、人员往来等领域取得长足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展顺畅。“日中两国首脑于2014年11月举行会谈后,中国游客的激增、留学中国的日本学生增加、自民党和公明党与中国共产党新建沟通渠道等,令人比较欣喜的话题着实不少”。^[15]但中日关系仍然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如何把握机遇,有效缓和两国矛盾与分歧,寻求共同利益,保持双边良性互动的长久性,还需要两国以“四点原则共识”面对中日关系中随时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国家间相互作用是指一连串永远变化着的事件。一国的行动……会传递给另一国,促其产生反应,然后又反馈给第一国,如此循环不已”。^[1]值得关注的是,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的历程表明,由于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历史、领土和东海海洋权益等问题,中日政治互信仍具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随着中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两国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显现,双方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摩擦时有发生,并将可能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为此,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说:“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2014年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安倍晋三表示,“日中关系发展有利于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与发展”。“日方愿意落实双方去年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积极推进两国各领域的交往与对话”。^②对于能否确实贯彻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各项内容,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认为,双方在共识中强调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但关键还要看安倍政权今后是否切实信守承诺,诚实遵守四点原则。^[16]

可以说,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是积极探讨两国未来的双边关系定位,目的是避免因历史、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网站, <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dt/t1216834.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网站, <http://www.china-embassy.or.jp/chn/zrdt/t1257920.htm>。

领土、海洋权益等因素形成中日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摩擦和冲突,降低中日及亚太地区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目前日本对华政策存在着一定变数和不确定性。鉴于日本政府仍然主张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姿态,能否通过中日对话与磋商,缓和分歧与矛盾,累积政治互信,仍将是考验日方能否维护中日两国关系和平、稳定与发展的试金石。

参考文献

- [1] [美]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60.
- [2] 杨洁篪会见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08349.shtml.
- [3] 李建民.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1989-2006)[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141-145,198.
- [4] 日本共同社2008-05-07电.
- [5]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EB/OL].新华网东京,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4/12/content_5968135.htm,2007-04-12.
- [6] 人民日报,1997-09-06.
- [7] 桐声.关于中国东海的钓鱼岛、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问题的法律分析[J].日本学刊,2003(6).
- [8] 李中邦.日本调查大陆架及台湾地区政治情势对钓鱼岛主权的影响[J].日本学刊,2003(6).
- [9] 日本共同社,2005-01-16电.
- [10] 中日在东京发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EB/OL].新华社东京,2007-04-11电, http://www.gov.cn/ldhd/2007-04/11/content_579410.htm.
- [11] 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就日中摩擦展开讨论[Z].日本共同社,2012-09-19电.
- [12] 第22回参议院議員選挙(平成22年度)公約関連[EB/OL].<https://www.jimin.jp/policy/manifest/>.
- [13] 「平成26年版防衛白書」[EB/O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4/pdf/26010103.pdf.
- [14]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日本国国会的演讲(全文)[EB/OL].新华网东京.2007-04-12电, http://www.gov.cn/ldhd/2007-04/12/content_580519.htm.
- [15] [日]川島真.「綱渡りの続く日中関係」[EB/OL].<http://www.nippon.com/ja/editor/f00032/>.
- [16]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EB/OL].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08/c_1113165979.htm.

[责任编辑 许佳]

ABSTRACTS

Getting Out of the Crisis and Restarting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 Status and Prospec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ZHANG Tuo-sheng · 3 ·

Abstract: The intensification of dispute over Diaoyu Islands in autumn 2013 caused a serious security crisi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two countries were once at the verge of military conflict. At the end of 2014, the two sides reached a four-point agreement after strenuous negotiation. Bilateral relations thus moved out of the most dangerous stage and started to move towards stability and improvement. However, China and Japan still have major differences and face new challenges. Only by further implementing the four-point agreement, managing well their maritime disputes and historical frictions, resuming and strengthening dialogue and trying their best to develop all possible cooperation will the two countries gradually restore their relations to normality and embark on the correct path towards a new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mutual benefit again.

Key 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Diaoyu Islands Crisis; Crisis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ino-Japanese Historical Issues; Sino-Japanese Dialogue

Discussion on the Fea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the Sino-Japanese Four-Principle Consensus

LV Yao-dong · 13 ·

Abstract: The four-principle consensus is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ith constructive nature and feasibility to objective reality.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ortuous process confirmed that only adhering to the spirit of "four political documents", taking history as a mirror and facing the future can really develop Sino-Japanes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till has a desire for developing the Sino-Japanes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t continu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the overall situation perspective eases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agrees on Sino-Japanese four-principle consensus under the premise of Japan commitment to the spirit of Sino-Japanese four political documents. The two sides agree to use a variety of more than double channels to gradually restart political,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dialogue, which efforts to build political mutual trust. It will become the new norm for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to strive to achievement in unity of logic and history on Sino-Japanese four-principle consensus.

Key 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our-Principle Consensus; Feasibility; Constructive Nature; Uncertainty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ternational Context, Spatial Extension, and Strategic Content

WANG Zhi-yuan · 24 ·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xter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 Clearly defin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spatial extension and the specific meaning is undoubtedly the necessary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premis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the right judgement of great powers game, and correct grasping important issues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countries. By defining the extending space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using "outline AHP" and dividing the space into core area, mutual beneficial area, and radiation area, can we find that economic geography and foreign strategy are closely connected. The former is reality base and the latter is long-term goal. This means that traffic cooperation is the first and necessary step for effective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Key Word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Economic Geography; New Regionalism; Outline AHP;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Study on the Unilateral Utilization of Oil and Gas in Disputed Maritime Zone

DONG Shi-jie · 36 ·

Abstract: How to unilaterally utilize oil and gas in disputed maritime zone without getting provisional arrangement is an inevitable issue. Firstly, unilateral transitory exploration and bid inviting are permitted in international law. Secondly, unilateral non-transitory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are prohibi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We can take counter measures or law enforcement against unilateral non-transitory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With respect to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insist joint development in first. Then China should promote exploration for oil and gas actively and operate unilateral exploitation in due time, and execute law enforcement decisively.

Key Words: Disputed Maritime Zone; Unilateral Exploration; Unilateral Bid Inviting; Unilateral Exploitation; Unilateral Law Enforcement

The New Global Energy Landscape and China's Policy

KONG Xiang-yong LI Li-wen · 47 ·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2014, the oil price has been declining due to the interplay of the increasing supply of oil, the shrinking demand from Europe and Asia, and the return of strong dollar. The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energy landscape is also attributed to the shifting of global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centers,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less uncertainty in predicting the fluctuation of the oil price. In terms of its impacts, the new global energy landscape will not only differentiate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but also the emerging markets. In the meantime, it is the new trends of the global energy outlook that makes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more complicated and put Russia to shift its strategic focus eastward. As for China, it should formulate policy options based on her own strategic goals and stakes.

Key Words: New Global Energy Landscape; Shale Gas and Oil Revolution; World Economic Landscape; Global Geopolitics; the Middle East; Russia; China

Analysis of Russia's Policy Towards Korea Peninsula in the New Century

CHEN Xin-ming LI Yuan-zheng · 58 ·

Abstract: The basic reason for the periodic tension of Korea Peninsula includes heritage of the Cold War, the policy of USA and Republic of Korea (ROK), and the competition and opposition between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 and ROK.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is the important measure for DPRK to fight for survival of the regime and deal with power imbalance, and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intense situation of Korea Peninsula. Russia concerns security and economy interest in the Peninsula, and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s in line with Russian interests. Russia